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6007

智能劳动“解放幻象”的现实表征、 生成逻辑与消解路径

向汉庆, 孙宏川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生产模式的重构, 智能劳动逐渐成为劳动演进的新形态。其在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同时, 具有“解放幻象”的倾向。从主客体维度看, 智能技术迭代包含着对智能劳动主体的数据“吸收”与传统产业中劳动主体的“排斥”; 从时间维度看, 劳动时间的算法化压缩并未带来自由时间的实质享有, 反而导致时间支配权受制于资本逻辑; 从价值维度看, 工具理性主导下劳动价值数据化, 引发劳动者主体性消解。智能资本通过算法逻辑建构起新型劳动体系, 加剧了智能劳动主体思维、劳动过程、劳动成果不断异化的复杂性, 使得算法逻辑和资本逻辑作用下的智能劳动解放成为幻象。人工智能在人本位理念引领下实现劳动解放, 还需要从强化劳动主体、创新技术客体、规制智能资本等维度出发寻求答案。

关键词: 智能劳动; 人工智能; 智能资本; 劳动解放

中图分类号: F014.2; F0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6-0055-08

The Liberation Illusion in the Intelligent Labor: Its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Resolution Pathways

XIANG Hanqing, SUN Hongchuan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production models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telligent labor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new form of labor. While it enhances social productivity, it is also inclined to foster an “illusion of liberation”. From the subject-object perspective, the ite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ntails the data “absorption” of subjects engaged in intelligent labor and the “exclusion” of labor subject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rom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algorithmic compression of labor time has not led to the substantive enjoyment of free time; instead, it has subjected the autonomy over time to the logic of capital. From the value perspective, the datafication of labor value, driven by tool rationality, leads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workers. Intelligent capital, through the logic of algorithms, constructs a new system of domination, exacerbat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alienation of the thinking, labor process, and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r. As a result, the liberation of intelligent labor under the combined operation of algorithmic

收稿日期: 2025-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哲学研究”(22CZX005)

作者简介: 向汉庆, 男, 湖南古丈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and capital logic becomes an illusion. To achieve genuine labor liberation under the human-centered concep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must seek solutions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labor subject, innovating the technological object, and regulating intelligent capital.

Keywords: intelligent lab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capital; labor liberation

“人工智能以其超强算力正形塑着人们的智能生活方式,智能劳动替代体力劳动成为主要劳动模式,创建着崭新的智能社会形态”^{[1]97},以人工智能为载体实现劳动解放成为一个热门的时代话题。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对其阐发了不同见解。王水兴等^[2]从生产力角度出发,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生产力要素智能化的新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智能生产力对于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齐志远等^[3]通过分析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智能生产体系,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使人类从异化劳动中获得解放,实现人的创造性复归;王秀成等^[4]从人工智能的双重属性展开分析,认为人工智能丰富了人的交互方式,拓展了人改造社会的能力,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驱动力,但也催生出了异化现象,具有一定的风险与历史局限性。在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中,多数学者对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智能劳动持积极态度,并从技术层面进行了论析,但理论探讨中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本文从主客体、时间与价值维度出发,探讨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理性审视智能劳动的困境与其生成逻辑,提出了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幻象、推动智能劳动解放的路径,以期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助力智能社会劳动的解放。

一、智能劳动“解放幻象”的现实表征

智能劳动在带来社会多维变革的同时,具有“解放幻象”的倾向。从主客体维度看,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包含着对智能劳动主体的数据“吸收”与传统产业中劳动主体的“排斥”;从时间维度看,劳动时间的算法化压缩并未带来自由时间的实质享有,反而导致了时间支配权向智能资本转移;从价值维度看,工具理性主导下劳动价值数据化,引发劳动者的主体性消解。这三方面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智能劳动的“解放幻象”。

(一) 智能劳动主体的“吸收”与传统产业劳动主体的“排斥”

波兰尼的脱嵌理论表明,“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5]市场不能脱离于社会结构独自存在,工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自然也“服膺于商品逻辑,受制于市场规则”^[6],无法脱离社会宏观大趋势的调控。在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传统劳动正逐步转化为由数据驱动的“智能劳动”。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开始靠“吸收”智能劳工的数据提高,这使得市场对于“数据原料”和算法管理的需求不断增多,催生了智能劳工这一新型劳动力体系。当智能劳工将知识、经验与创造力转化为数据生产行为时,其劳动成果既“转化为人工智能资本化的智能社会关系存在形式”^{[1]98},也反向推动社会分工体系的革新,创造了大量以人工智能体系为支撑的新兴智能劳动产业与岗位,以AI训练师、数据伦理治理专员、智能系统协同开发者等为代表的新兴职业群体迅速崛起。根据领英调查预测,到2030年,全球70%企业岗位的招聘都将因为AI的诞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新兴产业的劳工须兼具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技术与跨领域协作的能力^[7]。这种劳动形态的演化既印证了市场伴随技术创新而不断变化的规律,也为劳动者提供了通过知识革新实现价值跃迁的路径,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中开辟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空间。这种对智能劳动主体的数据“吸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生产、创造出大量脑力劳动岗位。

但从另一面看,智能技术的迭代也包含着对传统产业中的劳动主体的“排斥”,这不可避免地加剧着社会的底层矛盾。因为从本质上来看,人工智能是由智能劳工输入的“数据原料”训练出的产物,是由智能劳工的主体意识所驾驭的生

成式技术。换言之, 人工智能是“能够产生智能行为的算法代理人”^[8], 是由人所产生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是自动化的客体工具与“人脑机器”。所以, 人工智能依然具有马克思笔下“机器”的属性, 具有“不断吸收工人的趋势”与“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9]566}的双重趋势。这种对工人的“吸收和排斥”会造成“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9]566}。此外,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对劳动的需求, 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 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10]726}。人工智能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的同时, 市场对传统的劳动产业形式以及劳动需求的依赖正逐渐减少, 部分劳工(如低技能工人、传统制造工人等)存在着被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困境。如工业时代的蒸汽机一样, 人工智能这一现代机器作为劳动资料, 从一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11]。社会因此产生了“相对过剩的人口”, 劳动工人时而被吸收到生产中, 时而被智能机器客体所替代。这种生活上的频繁波动, 显然不意味着劳动的解放。无疑, 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具有解放劳动主体性质的机器客体, 但其仅为劳动的解放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技术带来的社会产能提高与劳动解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若存在智能资本的驱使,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主体被人工智能奴役, 可能产生智能的贫困而加速扩大已有的社会鸿沟。

(二) 劳动时间的“压缩”与自由时间的“被支配”

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 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532}, 人类对时间的意识形成于物质生产实践。在农耕时代, 劳动者以东升西落的太阳作为衡量时间的标尺, 遵循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在工业化时代, 劳动实践同样构成了社会时间计量体系的基础。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计量尺度, 阐释了工业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类所面临的时间困境。简言之,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中, 劳动时间是人被迫维持生存所需的时间, 它与人类自然生存需求直接相关; 而自由时间则是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时间, 是人类实现自主发展、追求个人成长和创造的空间, 是“剩余价值的时间存在形态”^[12]。马克思认为, 人类要实现人为人的最高本质, 驶

向“自由王国”, 必须减少劳动时间, 增加自由时间的自我支配, 即“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3]。智能技术所具有的能力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了可能, 出现马尔库塞^[14]预示的结果, 即现时代的自动化现象有可能将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关系颠倒, 人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 自由时间不断增多。

但从现状看来, 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属性与传统劳动结构并不完全兼容, 劳动时间的算法化压缩并未带来自由时间的实质享有, 反而导致时间支配权受制于资本逻辑。具体来说, 一方面, “决定人类生存内容的, 不是劳动时间, 而是自由时间”^{[14]164}。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人类提供更多自由时间, 减轻工作中的繁重负担, 帮助人们从机械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进而腾出更多时间来追求自我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无人化”和生产自动化, 许多重复性、单调且消耗时间的工作可以被机器和智能系统代替, 这不仅意味着社会劳动力得到了节省, 也意味着生产过程速度不断加快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大大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 为自由王国的建立提供了时间基础。然而, 另一方面, 由于资本私人属性的存在, 智能劳工通过智能工具节省下来的剩余时间也会被资本不断压榨、支配与占有。社会劳动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人工智能算法系统生产周期的加速, 理论上应该使劳动者从智能机器中解放出来, 享有更多“自由时间”, 但实际上, 资本的增殖逻辑却使得这部分本应属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时间被重新压缩为资本周转周期。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 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新载体, 转化为剩余劳动, 导致劳动者陷入“加速—疲惫—再加速”的恶性循环。因此, 虽然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创造了时间条件, 但其并未直接实现劳动时间的解放。劳动时间的真正解放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变革、资本的控制和生产关系的重新定义。

(三) 工具理性的“丰富”与价值理性的“削弱”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模型对海量人类知识进行压缩与重组, 其智能思维正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 在千行百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成为社会运作和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如在媒体内容生产领域, 可灵 AI 智能模

型可通过输入文字,在短短5秒内生产一段完整的动画;在智能化运输系统的开发方面,天津港北疆港区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将提送箱在港作业时间缩短26.2%,远洋干线船舶在泊船时效率提升28%;此外,人工智能大模型还能够通过视频或者图像快速识别作业现场的安全隐患,未来有望实现24小时的自动化安全监管,弥补人工视野的不足^[15]。这一切都使得劳动者借助智能工具的感性体验变得愈加丰富。人工智能的技术实践似乎印证了马克思在“机械论片断”中预言的“一般智力”的物质化进程。他这样写到:“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6]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机器和技术的进步,这种“智力”逐渐从个体劳动者的头脑中转移到机器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中,从而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社会“一般智力”的物质化工具。当智能系统将人类历时性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实时调用的数据资源时,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便具备了认知再生产的能力并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

工具理性的丰富看似为社会带来了技术的便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的解放。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劳动价值愈发数据化,引发了劳动者主体性消解。具体而言,尽管人工智能几乎在人类感兴趣的所有领域都超越了个体的一般智力,却并未带来价值理性的同步,反而导致了价值理性的削弱:人类劳动精神、劳动思维的退化危机已然显现。有学者认为,“生成式AI看似可以助力创造力产生,实则有可能伤害创新的原动力”^[17];也有实证研究表明,频繁使用人工智能的对话系统会导致学生认知能力的下降、信息保留能力减弱以及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已有信息依赖性的过度依赖^[18]。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过程中,使用者的三种关键认知能力:决策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分析思维能力会逐渐下降。这是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等)通常会以一种看似具有严密推理逻辑的形式向用户传递生成的数据,造成人工智能无所不能的幻觉,而这种幻觉非常危险。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工具属性与服务角色。部分使用者直接将人工智能作为实践主体,对其生成

的内容或数据不加判断推理便直接应用,导致价值理性的削弱与缺失。技术的合理性正在消解劳动者本身积累的经验,本应由主体间协商的价值问题被异化为技术问题,人类思维的主体性正在被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因此,唯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才能避免智能技术异化为支配人类的异己力量,真正实现技术发展与人本价值的辩证统一。

二、智能劳动“解放幻象”的生成逻辑

在智能劳动时代,劳动异化危机非但未被改变,反而在智能资本的裹挟中显得更为隐蔽与复杂,引发了主体思维、劳动过程与劳动成果的异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智能劳动的“解放幻象”。只有认真审视智能劳动“解放幻象”生成的逻辑,才可能在人类对智能技术愈发依赖的同时,创新主体思维,防止由人类所创造的智能工具与人类自身所对立。

(一) 智能主体异化: 算法霸权对主体思维的“殖民化”

主体思维是人类彰显其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劳动个体通过实践不断积累知识,汲取经验,根据自身不断更新的认知改造着客观与主观的世界,并以不同个体间思维与逻辑的联合,推动着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算力、数据成为智能社会发展的技术层面“第一需要”。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社会劳动主体,其思维的多元性逐渐被人工智能算法的霸权所取代,面临着AI“殖民”的困境。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知识储备并非来自直接经验,其是由智能劳工输入的“数据原料”经过训练后生成的产物。换言之,人工智能技术依赖的是人类现有的知识和数据基础,它无法超越这些数据,生成超越社会“一般智力”之外的知识和创见。人的思维之所以独特,恰巧在于其丰富的创造性、对已有事物的否定性以及对未来事物的突破性,这种规律决定了人的思维是固定工具所无法比拟的。

虽然人工智能的诞生使得个体获取知识的方式变得更加便捷与简易,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仅通过与人工智能简单的对话,就了解各个领域与行业的新闻、热点以及专业性内容。但与此同时,

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的已有知识,而非通过自我思考得出经验与结论,则可能逐渐失去批判能力,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人不再认识和实现自身,而是被无生命的事物和规律所统治”^[19]的单向度的人。一方面,算法系统通过界面交互、行为追踪预测与及时反馈,将智能主体的思维编码为可计算的数据流。如短视频创作者根据人工智能所推荐的“热门标签”进行内容生产时,其创作思维就已经被算法“殖民”为数据接口的延伸物。这种“殖民化”危机在于人类不再是通过感官或经验认知世界的主动探索式,而是经由算法过滤筛选的被动推送式,主体思维迷失在庞大的数据信息流中,完成了“自我殖民”。另一方面,从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前端来看,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的智能劳工的思维影响着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并且这种前端数据易受到资本家的控制,看似客观的人工智能实则拥有着主观的政治立场、价值观与世界观等。在中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未诞生之前,世界的 AI 技术被美国所垄断。美国在享受着技术带来的经济红利的同时,也在利用着 AI 作为殖民世界的“武器”。OpenAI 公司研发的 ChatGPT 工具与美国其他互联网巨头谷歌 (Google)、脸书 (Facebook) 或推特 (Twitter) 等一样,皆可能成为其实现数据垄断、植入意识信息控制的平台。这将导致使用者在不自觉间受到西方思维模式影响,从而被其宰制与操控,逐渐失去自我决策与判断的能力。

(二) 智能技术异化:“技术拜物教”对劳动过程的“符号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拜物教”通过掩盖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将商品中的人际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并通过物欲至上的理念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10]90}。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现代社会产生了“科技无所不能,科技征服世界”的错觉,形成与商品崇拜类似的“技术拜物教”现象。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技术与劳动一样,并不具备内在价值。只有当技术作为劳动资料的一部分,服务并赋能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时,它才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价值。因此,技术的诞生应当是人类生命体验的一种选择,是连接人与自然、改善人与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技术拜物教”中赋予其自主权利的存在。

智能技术的自主运算掩盖了技术背后资本控制与阶级关系的存在。在智能算法的支配下,人类的劳动过程逐渐变得非物质化与符号化,社会矛盾与经济分化现象愈加明显。具体而言,数据和算法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流程。人工智能将高度发达的数据和自主执行的算法转变为智能生产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使得生产过程逐步智能化与自动化,智能生产不再直接依赖智能劳工的技能,而是通过精密设计的技术系统架构来驱动整个生产过程。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驱动智能生产和创新的核心要素,数据储备则成为决定人工智能技术发达程度的指征。不难看出,在数据至上的智能社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逐渐被降维为对算法指令的机械反应,“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过程被数据符号所主导,劳动的异化通过“符号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剧。劳动者不再直接感知到自己的劳动如何创造出价值,而是面临一个不具有人际关系与价值连接的,由符号、数据和算法构成的外部世界,这使得劳动更加脱离现实和具体。如在智能技术赋能下的共享经济平台(如滴滴、美团等)中,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过程被平台上的评分系统和数据指标所驱动。这些符号化的数据(如星级评分、接单次数、客户评价等)成为衡量劳动者价值的重要标准,而劳动者在实际工作中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技能,仅在智能数据的监控与算法奖惩中得到反馈与体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劳动者与劳动生产过程的关系,反而使他们更容易陷入“多余”的境地。劳动者逐渐从生产活动中被剥离,沦为智能技术的附庸,进一步失去了人类劳动本应具备的意义和价值。

(三) 智能资本支配:数据垄断对劳动成果的“幽灵化”

经过智能技术赋能,资本逐步演进为智能资本形态,“不费资本家分文”^{[20]186}的智能生产力正在成为智能资本抽象“幽灵化”支配的重要工具。相较于传统工业体系中资本对工人的物化支配,智能资本的“幽灵化”显得更加复杂。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不但具有传统机械的生产工具属性,也拥有着人类认知能力(一般智力)的一部分,其可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智能劳动主体共同融入智能生产的进程中。这种智能知识力量的资本

化使得智能劳动成果的产权变得模糊,原本属于人类认知活动产物的智能劳动成果以“数据生产资料”的形式被智能资本无偿征用。具体而言,一方面,数据抽象化正在重构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异化的路径。智能劳动者在智能平台上产生的行为轨迹、认知决策乃至情感反馈,在智能资本的隐秘控制下,通过API接口、传感器网络等技术装置被实时捕获并转为数据重新嵌入到智能生产过程的前端。这些原属于劳动者思维活动外化的数据,却通过回流形成了“劳动—数据—资本”的剥削循环,转化为智能资本训练算法模型的养料。智能劳动者看似在为自身创造价值,获得完成劳动契约的劳动成果,其实是不自觉地为资本创造了超额的生产要素,创造出了“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智能资本强权^{[20]204}。另一方面,垄断的数据不断回流,与算法、算力相结合,制造出新的异化危机。当智能资本将海量行为数据与智能模型相结合时,人工智能系统便获得了自主进化的能力。这种进化过程日益脱离劳动者的实质控制,成为“并非智能劳工利用智能劳动条件,而是智能劳动条件利用智能劳工”^{[1]103}的智能生产模式。例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平台中,用户协议中通常会包含一项名为“改进用户体验”的默认强制选项,并声称该选项有助于改进输出产品的内容与质量。由于此选项的存在,大多数劳动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收集了使用的数据(包括文本、图片、文件等),这些数据会自动成为人工智能训练数据。更有甚者,智能劳动者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所生成的、本应构成知识产权的认知劳动成果,也会以“改进用户体验”的名义无偿转化为训练数据,并在智能资本的幽灵化剥削中成为智能生产中的一环。大多数劳动者实质上成为算法优化的免费数据劳工,其劳动成果被异化为资本数据垄断的一部分。

三、智能劳动“解放幻象”的消解路径

人工智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生产力基础,但社会的生产关系结构却未曾改变。智能劳动在本质上克服不了资本的强制剥削与主体能动意识的减弱。如何才能让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智能劳动生产,实现人为人的最高本质,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一) 强化劳动主体的实践地位,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思维

如何平衡技术进步与人类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关乎智能社会走向的重要命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感性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为这一命题的探讨提供了哲学根基。他强调,实践的本质需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即人类不仅是改造世界的主体,更是技术发展的价值归宿。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要以人的尊严与主体性为基石,而非让技术凌驾于人之上。一方面,应不断强化劳动主体的实践地位,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原则,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范式。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劳动资料的工具性延伸,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实现“1+1>2”的叠加效应,将人类从单调、重复的操作中解放出来,从而转向更高层次的创新与管理活动,而非取代人类在劳动中的主导地位。当前,人工智能内容产出仍依赖于人类积累的语料库与价值判断标准,因而建立人机和谐共生的环境,才是实现智能社会健康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激发智能劳工的创新思维并明确技术客体的位置,是确保技术赋能的关键。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渗透,本质上是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技术性置换”。这种置换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劳动异化的加剧——当人类过度依赖机器决策时,劳动过程可能从“自我实现”退化为“机械服从”,人的创造性被算法逻辑所压制。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异化使“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21]。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风险以更隐蔽的形式重现。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与信任可能使人类在“智能化”浪潮中丧失对自身价值的判断,产生“技术拜物教”的风险。因此,应当将技术客体转化为思维主体训练的“镜像工具”,使技术从“替代思维的威胁”转化为“激发创新的催化剂”,充分激发劳动者的思维潜能。例如利用智能机器学习可视化技术,使程序员在利用数据训练模型时,通过双屏交互界面,将程序员的特征工程预期与模型实际决策路径进行对比,将抽象的认知偏差量化为可追溯的数值指标。此外,开发者还可在对抗样本沙盒中手动调整决策边界,观察模型响应并以数据峰值的形式触发思维盲区的预警,直观观察自身算法决策逻辑与理想算法

决策逻辑之间的差异,实现智能工具搭载下的实时反馈与交互式调整,在实践中及时反思自身编程思维的局限性,实现“思维编码—镜像反馈—认知优化”的良性循环。

(二) 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构建技术治理协同机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大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体系通过“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构建了“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种有机体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0]443-444}。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算法和算力成为了新的“自然力”——通过处理海量数据、运行复杂算法,人工智能替代了人类在认知、决策和执行中的部分劳动。同时,人工智能也可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结合,系统化地应用于生产和服务领域,取代依赖经验的传统模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工智能是马克思机器理论在现代的逻辑体现。在智能社会,同样唯有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才可能打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束缚,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实现劳动解放。因此,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以技术赋能生产,是提升生产力水平、实现劳动解放的必经之路。具体来说,一方面,以制度赋能技术攻坚。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通过政府统筹新型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如智算中心、数据平台等,避免人工智能产业建设失衡;以市场激活企业智能技术研发活力,通过政策引导与跨部门协作,形成“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应用”闭环生态;以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场景为突破口,推动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并通过技术增效,减少低效的传统体力劳动,将马克思“以自然力替代人力”的理论转化为现实智能生产力跃升,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22]。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技术治理协同机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可控问题。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隐私、道德伦理、政治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国家应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确保数据隐私与安

全,防止算法偏见和技术滥用。通过制定数据保护法、完善技术伦理审查,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公平、稳定和可持续性提供保障。此外,政府、企业、公众应共同合作,参与人工智能的监管,确保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发展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为社会带来长远的利益。

(三) 重构人工智能工具属性,规制智能资本的劳动支配

人工智能本应赋能于人类劳动解放,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与资本增殖性的耦合却催生出新异的异化形态——智能算法通过数据监控、行为预测和绩效评估等手段,正在重构劳动过程的控制体系。要破解该困境,需要从工具属性与制度体系双重维度出发。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性重塑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23]因此,在技术层面需要构建以人本位为主的智能伦理框架:借助智能算法将以人为本、人心向善等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嵌入到数据前端的逻辑算法之中,使人工智能具备和人类相似的情感、认知等道德伦理,以此纠正人工智能对智能劳动者裹挟与宰制,防止人工智能在智能资本驱使下成为控制智能劳动者、阻碍全人类实现劳动解放的异己力量,引导人工智能工具技术研发朝着人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完善规范智能资本制度体系,形成智能劳动的“硬约束”。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规制剩余价值生产,推动自由时间的转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人工智能创造的劳动成果归属社会共同所有,就是对资本的一种规制。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抑制智能资本的算法霸权,保障劳动成果的公平与公正。资本主导下的智能技术常通过算法黑箱隐蔽剥夺劳动者议价权,形成机械化的“数字泰勒主义”。劳动者在算法驱动下沦为“数据劳工”,其劳动贡献被系统严重低估,应当将劳动价值量化,使劳动者的贡献变得更为透明。在智能劳动保障领域,通过政府调控与市场协同,规制资本的短期逐利行为。资本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往往受短期回报率驱

动,一旦技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资本可能迅速撤离转向金融投机,导致关键技术“空心化”。因此,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才可能抑制智能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支配,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实现人类劳动解放的现实力量。

智能劳动虽然极大地改变了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模式,带来了劳动过程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但它并未创造出独立的剩余价值。劳动者依然面临机器和资本的双重剥削,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因此改变。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问题,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人工智能仅在某种程度上为劳动解放提供了技术上的准备。要实现全面的劳动解放,必须超越技术层面,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唤醒劳动者的社会意识并强化全社会对劳动者尊严的认同,才可能消除智能劳动的异化,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民主的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培育无产阶级意识,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同时完善技术治理机制,有效防范人工智能在技术、伦理、社会等层面的风险,才能更好地促进智能生产力的发展,建立人机共生的和谐环境。

参考文献:

- [1] 温旭.人工智能资本化与智能劳动异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46(10):97-103.
- [2] 王永兴,刘勇.智能生产力:一种新质生产力[J].当代经济研究,2024,(1):36-45.
- [3] 齐志远,高剑平.从延伸、强化到替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45(7):103-110.
- [4] 王秀成,陈欣.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优势、风险与实践策略[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5):112-121.
- [5]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6.
- [6] 刘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工人概念及其理论价值[J].湖湘论坛,2024,37(5):75.
- [7] 宁佳彦.领英谈AI时代用人:2030年70%岗位需求将变化[N].第一财经日报,2025-02-27(A10).
- [8] POOLE D L, MACKWORTH A 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undations of Computational Agen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95.
- [12] 刘方喜.“剩余价值的流转”与“自由王国”:《资本论》美学维度的重构及其意义[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9(1):100.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7.
- [14]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黄勇,薛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15] 王昊男,靳博,刘鑫焱.人工智能+加快赋能千行百业[N].人民日报,2025-01-07(13).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8.
- [17] 张宏宇,李倚天,索菲娅.生成式AI让我们更有创造力了吗[J].清华管理评论,2024,(5):74.
- [18] ZHAI C P, WIBOWO S, LI L D. The Effects of Over-Reliance on AI Dialogue Systems on Students' Cognitive Abil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J].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24, 11(1): 28.
- [19]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M].程志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6.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
- [2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0.
- [23]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29(2).

责任编辑:陈璐